蔡骧与《北京人》

□张　帆

蔡骧何许人也？大约多数戏迷都说不上来了，尤其是60岁以下的，无论您是圈里人还圈外的，多数人都不知其人，更有甚者，前两天我问一位80多岁的曾经搞过话剧的老友，他竟然也不知道！这让我感到很痛苦也很无奈，心想：这么有名的老艺术家就这样淡出人们的视线了？唉！

蔡骧是1923年生人，如健在应该是98岁高龄。遗憾的是他去世过早，2001年走的，享年78岁。去世20年了，这可能是大家忘却他的主要原因。

早在1940年他毕业于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主修编剧，导师是曹禺。毕业后先后在江西、广西、四川等地剧团做演员和导演。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在南京、上海和中央广播电台做广播剧的导演工作。1956年他为中央广播剧团话剧团导演了曹禺的《北京人》，一炮打红，多地巡演，总计演出200余场，在那个年代是震惊全国的新闻。

说一说蔡骧与《北京人》最初的相识。那是他从南京国立剧专毕业后的1940年，正在江西的一个剧团导戏，一天他突然收到一个包裹，打开一看是两个出版不久的剧本《北京人》和《蜕变》，剧本的扉页上有曹禺的题字——“骧弟留念：家宝”。家宝即曹禺的名字万家宝。他心想，曹禺是我的导师啊，怎么能称我为弟呢？我是他的学生呀！他迫不及待地放下手边的工作，读起剧本来。《北京人》很快就抓住了他的心。读罢，他模糊地觉得剧本中有深沉的内涵，有美丽的灵魂，有辛辣的讽刺和幽默，更有他喜爱的契诃夫式的抒情。他恨不得马上排出来。激动过后，他冷静下来，觉得一个初出茅庐不满20岁的青年大约驾驭不了此剧。于是他又读了第二遍剧本，读后他完全平静了，决定再等一等。

这一等就是15年。15年呐，这中间全国不知有多少个剧院（团）排过此剧，早已为广大观众所熟知。但奇怪的是演得出彩儿的、成功的、成为经典的几乎没有，由此可见排好此剧的难度之大。

1956年，蔡骧终于等来了排演此剧的良机。他所在的中央广播剧团决定排一部舞台剧锻炼演员，导演的任务落到他的头上，他当即说：就排《北京人》！

决心下定后，蔡骧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登门拜访老师曹禺，多年不见了，见了面还改不过口来，依旧喊“万先生”。他向先生说明来意后，曹禺劝他不要排《北京人》，还是选一出别的戏为好，曹禺说：《北京人》是“关门戏”，不好排，哪个剧团一排此戏必关门。

事实也的确如此，多少年来，虽有许多剧团排演过此戏，但成功的甚少，票房好的寥寥无几，弄不好就关门歇菜了。

但是蔡骧的决心已定，不听老师劝阻，执意要排。曹禺拗不过他，只好同意。

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曾经说过曹禺的担心有两点：一是担心这出戏同20世纪50年代的气氛不合拍，会遇到一些麻烦；二是担心一个新成立的剧团要排这么一出难度很大的戏能否拿得下来？这样的忧虑不是没有道理的。

结果蔡骧导演凭着一股不可阻挡的艺术上的朝气，不但拿下来了，而且他所导演的《北京人》成了至今无人能超越的舞台范本，这让曹禺感到蔡骧是个了不起的弟子。

那么蔡骧是如何把一出“关门戏”排成了一出“范本戏”的呢？我个人认为理由有四：首先是剧本的基础好，自不必多讲；二是导演对剧本的总体把握极准确而又符合现实；三是导演计划与欧阳山尊的《〈日出〉的导演计划》不相上下；四是演员阵容比较合适。广播剧团虽没有像北京人艺那样多的老艺术家，但也有一批像梅邨、李晓兰、纪维时、许欢子、王昌明等老一辈优秀演员。有了上述这几条就为这个戏的成功奠定了基础。

蔡骧的导演计划更是成功的关键。蔡骧所著《〈北京人〉导演计划》长达25万字，付出的心血之大可谓倾心之作。任何一位导演在排戏之前都会有方案、有计划，这是必须的。但把计划作到细之又细长达25万言的怕是寥寥无几。虽不必效仿，但其用功之精神实令人敬佩。

他在计划中详细说明了剧本的时代背景、全剧的矛盾处理、剧本的主题思想、最高任务、贯穿动作等。同时还对剧本的风格、节奏、色调、气氛也作了形象的说明，甚至他还为每个人物写了小传。同时也指出了每一个人物的“难点”，点得非常到位。这对演员的创作十分有帮助。

在他导演杂记中还特别谈到了下述几个问题：

一是曹禺的戏剧风格可以概括为交织严谨的生活逻辑，轮廓清晰的人物形象，紧张尖锐的戏剧冲突和真实生动、耐人寻味的台词。抒情也是曹禺风格的一部分。《北京人》就像一首诗，是诗与戏的交融，浑然一体。

另外，曹禺的戏一般都较长，演起来要三四个小时，所以删减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还要恰到好处。这出戏他费了很大劲才删掉了40分钟的戏，并删掉了小柱子这个人物。

二是愫方是这出戏的魂。她是曹禺在这出戏中塑造的最成功、最优美的典型。没有愫方，这出戏将失去光彩。因此要将愫方当作这出戏的灵魂人物。

三是强化愫方被迫害、被奴役的戏，同时强调曾浩迫害愫方的手段，这样一来愫方的形象更加突出，戏的主题也更加鲜明了。

四是要求所有演员要下功夫挖掘人物的潜台词，“潜台词”产生动作，“动作”又刺激潜台词，找准了潜台词戏就活了。

五是他对其他部门如灯光、效果、配乐等都提出了极为具体的设想，并指出不能各干各的，要有整体感，要有“一棵菜”的精神。他对布景要求尤其严格。曹禺对这出戏的布景说明很复杂，几乎把北京四合院中的所有元素都堆到了一起，难以实现。蔡骧明确提出不要搞自然主义，要有选择地把一个老北京人居住的环境展现出来，不但漂亮而且又适合演员表演就达到目的了。设计和制作者们做到了这一点。所以蔡骧在全剧最后的结尾有一段45秒让观众看景的处理。戏演到文彩扶着曾浩走下时，随着一声鸡啼和一声短促的火车鸣笛，音乐转入代表愫方和年轻一代“新生”的乐句。室外曙光初露，鸡鸣不已，一抹朝阳越过屋脊从南窗射入，投射在大客厅的门楣上。火车笛声延续着……这段让观众看空景的戏，与人艺《茶馆》结尾有异曲同工之效，且《北京人》在前。

1957年周恩来总理在舞台上和全体演职员合影

经过三个多月的日夜煎熬、苦苦追求之后，蔡骧带着他的剧组与观众见面了。时光已经到了1957年的3月15日，广播剧团的《北京人》在北京首演，连演10场，受到观众的赞赏。蔡骧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接着蔡骧带着剧组到郊区和天津演出17场，同样受到观众好评。他心中有底了。剧组立即返回北京于4月20日至5月19日在京连演33场，轰动了京城！一个并非以演话剧为主的广播剧团，竟然把一度称为“关门戏”的《北京人》演得如此红火，这在当时北京的话剧舞台上实属罕见。周恩来总理闻讯赶到剧场看戏，而且前后看了两遍（有传闻说看了五遍），无论几遍，证明周总理非常喜欢这出戏，尤其喜欢李晓兰饰演的愫方。

这出戏在当时连演了185场，绝对是个奇迹。曹禺在这出戏的排练期间多次亲临排练场关心指导，该戏正式与观众见面时，曹禺也出席了，并提出了许多可以改进的地方，遗憾的是记录稿在“文革”中遗失了。1979年，该剧恢复演出时，曹禺又去看了，并给出了“演得很真实，比人艺的好”的高度评价。

这里说几句题外话，北京人艺的《北京人》首演于1957年6月15日，首轮演出41场，次年又演了6场，共47场。以后这版《北京人》再没演过。其实当时人艺的《北京人》演员阵容相当强大：舒绣文、叶子、刁光覃、蓝天野、吕齐、黎频、董行佶、黄宗洛、李大千等都在这出戏中担任重要角色。像叶子大姐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把曾思懿这个角色演红了。然而就像曹禺说的，人艺的《北京人》没有广播剧团演得好。总之，蔡骧的《北京人》是所有演过该剧中的最好的（曹禺语）。

我与蔡骧老师很熟，尤其是在1985年下半年，北京广电系统忙着筹备成立北京电视艺术家协会，蔡骧是筹备组的重要成员，而北京人艺又是团体会员单位之一。北京人艺的电视工作由蓝荫海和我负责。这样我们和蔡骧老师的接触就多了起来，经常在一起开会，直到年底协会正式成立。后来的接触就断断续续了。我和蔡骧老师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曹禺家中，那是1990年9月24日曹禺80岁生日那天，我跟随剧院的几位领导到曹禺家中祝寿，不一会儿蔡骧老师也来为恩师拜寿了，大家欢聚一堂。这便是我和蔡老师的最后一面。一转眼，30余年过去了，他老人家也去世20年了。我十分怀念他！

仅以此文纪念蔡骧老师逝世20周年。

回忆二姐想到的

□文洁若

每每想起二姐文树新坎坷的一生，总是意难平，尤其年纪渐大，这感情与思念愈加浓厚，而二姐的染病身亡更是我们一家人长年的心病。那是1934年4月，陷入师生恋的二姐文树新与杨晦先生一道私奔去了上海，这样的事在当时自然掀起了轩然大波……当年7月，父亲回国，把母亲和其余的六个子女带到东京去读书。1935年4月19日，二姐在医院里生下女儿，小名绵绵。然而不到一个月，她就染伤寒去世了。周作人的准儿媳妇是二姐在孔德学校读书时的同窗好友，她闻讯赶去照看我二姐，结果也传染上了，不幸搭上了一条命。

此后几十年，我们一家人也各自经历着人生中的坎坷与奋斗。直到进入21世纪，杨晦的遗族偶然发现了二姐生前写的日记。经我的支持，九州出版社将它出版了，书名为《一个民国少女的日记》。翻看这本书，总让我想起我们此后的经历——

1936年7月，父亲被国民政府外交部除名，我们一家人又回到了北平。我和四姐文檀新入读位于东单头条胡同的日本小学校。原来父亲打算让两个弟弟也入读此校，然而一年级和二年级已没有名额，他们就去了崇实小学。父亲让我把白天在学校学到的日语课教给大弟弟。所以我读完六年级小学毕业时，大弟弟的日语也达到了小学毕业的水平，松本清张的《深层海流》就是我跟他合译的。

小学毕业后，我到位于东单三条的圣心学校念了两年英语。1942年转入辅仁大学附属中学女校初三，次年升入高一。1946年夏，考进清华大学外国语言文学系。1950年大学毕业，我考入了三联书店总管理处，那是一座四进的四合院，两间北房打通了，摆上了10张办公桌，编校合一。我还记得9月18日是我第一天上班。当天下午，郑效洵（1956年至1966年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就接到杨晦打来的电话，放下话筒他就写了个便条派我送到财务科。原来杨晦的小儿子病了，要求预支他的译作《无名英雄》的稿费。我打定主意，除非二姐的女儿主动找上门来，我绝不去认这门亲。从“小儿子”一词我知道杨晦又结了婚。他妻子生的女儿叫春城。绵绵知不知道自己的亲生母亲已死，现在的母亲是后妈，则不得而知。

进入20世纪80年代，绵绵果然找上门来了。我到北京大学去看望过杨晦三次。每一次都坐了一个多钟头。然而，彼此心照不宣，只字未提二姐的事。我三姐常韦（她原来叫棣新，二姐走后，改成常韦。大姐原来叫桂新，改为馥若。我原来叫桐新，改为洁若。只有四姐一直叫檀新），只去过一次。她抽冷子说了句：“你还把我二姐拐跑了呢！”

幸而当时只有我们三个人。我和杨晦都未吱声。

自1957年萧乾受运动影响以来，我的外语曾三次救了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第一次是1957年。1956年秋，张光年（光未然）代表作家协会，动员萧乾担任《文艺报》副总编辑。他本人是总编辑，另外两个副总编辑是陈笑雨和侯金镜，他们三人均为共产党员，只有萧乾是民主人士（民盟）。萧乾同意后，张光年进一步提出，要把文洁若也调到《文艺报》来。萧乾转告我时，说：“当记者比当编辑强。”但我有自知之明，知道我不是当记者的料。后来，张光年请我们二人吃了一次饭。席间他告诉我们，他专程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找楼适夷（时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辑），楼适夷坚决不放。他说：“文洁若同志是个好编辑，放谁也不能放她。”这是张光年告诉我们的。倘若真调成了，当时的情况，我估计也会被打成右派。当时划右派是有比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有200多人，不会涉及到我。

1958年1月，包括我在内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的80位工作人员被派到农村去劳动锻炼。11月回来时，出版社只留下40人，要把其他40人调到外地。当年4月，萧乾已戴着右派帽子被发落到唐山柏各庄国营农场监督劳动，连户口都迁走了，每月发给他26元生活费。家属到文联大楼去领生活补贴，每月40元。当时母亲和三姐文常韦都没有工作，我每月给她们40元。老大住宿费用约30元；老二在文化部幼儿园，每月20元；老三在锡拉胡同的私立托儿所，每月40元。我当时的工资是89.5元，刚好够三个孩子的费用。我的开支就靠我的业余翻译，那时我的翻译速度惊人，而且保证了质量。就拿投身于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日本进步女作家中本高子的《光枝的初恋》（原题《不死鸟》，意思是“火凤凰”，1960年版）来说，《世界文学》的编辑原来是让我和北京编译社各译一半。全文约3万字（指的是译成中文字数。日文译成中文，一般需打七折。1万字的日文，译成中文就成了7000字），需要8天内交稿。一个人译3万字是困难的，而且实际上只有6天，因为有两个星期日（当时是6天工作制），该社赶不出来。我告诉那位编辑我一个人包了。

小说的主题是描写砂川町（即小说中的纲岛村）农民反对美军扩充立川基地（即小说中的T基地）的斗争。我周一至周六每天晚上工作6小时，两个星期日各工作14个小时，8天就赶译出了21000字的手稿。1960年6月发表在《世界文学》上，稿费相当于我当时两个月的工资。

当时向我约稿的编辑很多，如《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是短诗、短文。《人民日报》一位朱姓的资深女记者把她原来约来的译稿拿给我求教，说她“看不懂”，我看着原文口译给她听。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赶译出来，次日一早取走译稿便见报了。倘若我到了外地，这些额外的收入都没有了，而且三个子女的上学问题怎么解决？1958年11月从农村回到北京，当我听到留下来的名单中有我时，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当天就写信告诉了萧乾。

第三次是1973年。1972年底，人民文学出版社调回了大批“五七战士”到本社。向阳中学的老师全走了，学校也办不下去了。连里让我回去为老三萧桐办理转学手续。老二萧荔已于1971年秋回京，当上了一名无轨电车售票员。为了让儿子上五中，我把南沟沿的小东屋换到了门楼胡同（“文革”期间易名喜报胡同）的一间小南房（当时是就近上学）。办完此事后，我就到商务印书馆去找陈原。1950年我在三联书店总管理处工作时，就向陈原主持的《世界知识》投过稿。由于内容不适宜，稿子被退回来了。我那时的领导朱南铣却跟我谈起此事，并且说：“陈原在打你的主意。”他指的是《世界知识》可以考虑接收我。那是1951年3月，总管理处的领导成员正在探讨成立人民出版社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事宜。我已找过许觉民，说我想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后来果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原听了我的陈述（我当时表示，希望陈原把萧乾和我都调到商务去编字典），回答说：“你嘛，我可以想办法，萧乾呢，太大啦，恐怕我调不动。”

既然一对子女均已回京，萧乾就有权享受探亲假了。他于1973年2月初回到阔别三年多的首都，开始跑医院，治冠心病。他到建国门内一家小小的中医诊所吃中药。我姐姐常韦帮他煎，还真有效。1973年7月，我被正式调回人民文学出版社（其实调令是商务印书馆下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知道商务调了我，临时才把我要回去）。我上班后，萧乾与其他9个人合译《战争风云》，这下子就有充分的理由不回干校了。

“文革”期间，我和张铁弦在同一个“牛棚”里待过。他是外国文学编辑室高级编辑。他说30年代在上海的时候，他到老友杨晦家去拜访时，见到了文树新。总的印象是：“面黄肌瘦”。刚怀孕，就弄成这个样子，也难怪生下娃娃就驾鹤西去。我也认为，当时他俩到了上海，杨晦应该先让二姐入上海的圣心学校，毕业后考震旦大学或圣约翰大学。取得学士学位后，有了工作，生活能独立了，再要孩子。三姐常韦后来告诉我，杨晦曾把一块绣花手绢儿夹在大姐文桂新的作文本里。大姐收到后毫无反应，杨晦又把另一块绣花手绢儿夹在文树新的作文本里。二姐恰似枯叶，手绢儿则是火柴。点燃后变成燎原烈火，怎样也扑不灭，只好双双一走了之。杨晦最早注意到文树新，是因为她的作文写得好。

文树新这本书是值得出版的，文树新的人生悲剧，对任何时代的少女都有警世作用。日记出版时，编者谢仲伟在《编者序——爱与死，古典主义的爱情》中交代了日记的写作背景。上海、南京和香港等地的报纸都发表了评论文章。

自打实施独生子女政策以来，社会上出现了奇怪的现象。有些大学生住进宿舍后，把自己脱下来的衣服用特快专递方式寄回家，让家长洗干净后再寄回学校。有个14岁的中学女生，只因为不愿意把头发剪短就干脆自杀了。每每听到这些，我总想起我的二姐，一个永远停留在民国的少女。

自二姐于1935年死在上海的医院里，四姐于1949年7月3日在美国的一座修道院里去世。三姐于1993年1月5日在北京逝世。大姐在美国定居。最小的弟弟在山西大同。我和学朴在北京。改革开放后过去这么多年。我们的国家越来越繁荣强大，油然产生还是中国最好的想法。我会像萧乾那样“写到不能拿笔的那一天”。同时，我想向年轻人建议：晚恋、晚婚、晚育。等到心智成熟，有了相当的成就，再考虑结婚生子女的问题。

作家的影响

□杨　岸

因了舅舅谷溪和路遥，我的“文学梦”悄然萌生。

记得那是1981年秋天，我才上初三。由于我偏好语文，课余时间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阅览室。有天下午，在学校阅览室，在一份《陕西日报》上我惊喜地看到一首诗歌《下寺湾》，作者谷溪。我睁大了双眼，这不是我舅舅——母亲惟一的哥哥吗？对，就是我的舅舅！我如获至宝，伴着剧烈的心跳，我悄悄将那张报纸折叠了再折叠，终于涨红着脸装进衣兜里。直到放学，我才在回家的路上将报纸拿出来：银杏子，金牡丹\花红柳绿洛河川\近山绿，远山蓝\香林古刹云盘盘\云中行呵雾中穿\腾云驾雾象鼻山……

回到家中，我将报纸拿到不识字的母亲面前，母亲笑着跟我说：就是生你的那年，你舅舅去北京开会，还和周总理一起照过相哩！从那以后，我一直以舅舅为荣，心里暗想，要是将来我也能跟舅舅一样，会写诗该多好……

1982年，我的一首小诗《追求》在《陕西青年》发表了。看着自己的名字第一次变成铅字，那激动的心情是无法形容的！特别是得来的4元稿费，不知该怎么去花。就是从那时起，曲折而漫长的文学之路，在我脚下一步一步向前延伸。

1983年夏天，初中毕业后，我打算到省城西安闯荡一番。从绥德县城出发，第一站我先到延安的舅舅家。按照舅舅的通讯地址，找到他单位的办公室，敲了好一阵门，才见一位身体壮实、中等个头的中年男子把门打开。一进门，整个房间全是烟味，地上到处是烟头。男子睡眼蒙眬，显然他是刚被我的敲门声惊醒的。他问我叫什么，是曹谷溪的什么人？我一一回答了他，而后他告诉我，今天是星期日，舅舅不上班。我转身离开，一路打听他说的“民众剧团”，找到了舅舅的家。

见到舅舅，我用责怪的口气说：“舅舅，你办公室住着个什么人？看把你办公室弄成甚了？！”舅舅说：“是路遥，写《人生》的作家。”

对路遥我早有所闻，但在舅舅办公室遇见的那个路遥，跟我平日里所想的“作家”似乎相差甚远。

在延安我小住了几天，就只身去了西安。辗转几个月后，我依旧回到了农村老家。1985年春天，为了躲避父亲为我安排的亲事，我再一次去了延安舅舅家，这一次，一住就是两年。

舅舅家在延安市场沟的凤凰山南麓有个独处的院子，叫“梧桐园”。院子青石小门上有一副对联：“背倚凤凰欲展翅，面临南山通天路。”这里不仅是当地文化人汇聚的场所，还有世界各地的作家、艺术家也爱来这个小院谈诗论画。

听舅舅说，1982年5月，陕西省委在延安隆重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40周年。省文化、艺术、演艺界的领导及知名作家、艺术家倾巢出动齐聚延安。时任陕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的李若冰把饭“派”到了舅舅家的梧桐园。当天的主食是荞面饸饹熬羊肉，酒水是甘泉县酿制的“美水酒”。人员分两批，上午安排胡采、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路遥、肖云儒、胡小海；下午安排陈忠实、贾平凹、京夫、邹志安。那一天的梧桐园，像“过事”（方言：办婚事）一样热闹。上世纪80年代“文学陕军”的阵容，通过舅舅家的梧桐园可见一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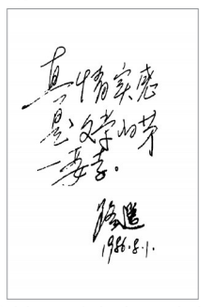
在舅舅的指导下，我开始大量阅读，写作也逐渐有了起色，诗歌作品相继发表，同时认识了不少作家和文学朋友。对我产生直接影响的作品就是路遥的《人生》和海波的《农民的儿子》。我甚至将小说人物高加林的命运跟自己连在一起，将刘巧珍视作心目中的恋人。后来，我和舅母的侄女番英相爱，她最终成为我现实生活中的“巧珍”。“梧桐园”令我终生怀想。

路遥是舅舅青年时期的朋友，也是舅舅家的常客，在舅舅家，路遥就像到了自己家一样随意。有次他一进门就说要吃杂面，问我当时的未婚妻：“会擀杂面不？”她说：“会哩。”当我将漂着葱花的“调汤杂面”端上桌，路遥问我：“有馍馍没？”我说有，他说：“拿一个。”这是陕北受苦人特有的吃法，杂面不耐饱，当时路遥正在《平凡的世界》创作当中。出门时，路遥让我舅舅为他小说里的人物写首诗。路遥走后，舅舅就开始动笔，大概到后半夜，才听到舅舅闭门休息的声音。

1985年夏天，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路遥小说选》，根据出版协议约定，征订量达到5000册才能开印。而当时全国各地只征订了1500册。在“梧桐园”家里，路遥问舅舅能不能在延安为他想想办法，舅舅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路遥坐在沙发上，长长地出了一口气。不久，舅舅就与延安地区新华书店订了合同。第二年开春书出了，3500册《路遥小说选》是我用三轮车从书店运回舅舅的办公室。接着，舅舅又帮我买了一个架子车，改装成一个“流动售书车”。

当时的延安，还是一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小城市，我推着小板车走街串巷，但买书的人很少。在一次回家的路上，我对舅舅说：“你实在不该把路遥的书买下这么多，今天书店又来催款……”还没等我把话说完，舅舅便火了：“像吃了后悔药似的，哪像个男子汉！赔了，市场沟还有五孔窑洞哩！”

有一天上午，路遥和他在延安报社工作的四弟王天乐，来到我的书摊前询问书的销售情况。我说：“还没有一个作家的书卖过百册的，你的书已经突破了500册了。”他感激地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兄弟，你可帮了我大忙了！”其实那是我有意夸大了数量。离开时，他拿起一本《路遥小说选》，在扉页上写下：“真情实感是文学的第一要素——路遥。1986年8月1日。”这本书我至今珍藏。



我与路遥最后一次接触，是这年冬天我离开延安前夕。路遥和舅舅在书房整整谈了一下午话，吃过晚饭，我骑自行车送路遥回宾馆。上南门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和路遥都倒在马路上，车把上挂着一包舅舅送给路遥的大红枣也撒了一地，我忙扶起路遥问：“摔疼了没有？”他笑了笑说：“没甚，没甚。”并指着地上撒落的红枣说：“叫它滚，看它能滚到哪儿。”到了宾馆门口，我们握手告别，他转身提着那包红枣，佝偻着身子走进宾馆的大门。夜幕下，他的孤独的背影长久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每次想到路遥，就会想到那个背影，想到延安的梧桐园。

因了这些作家的影响，我的文学梦似乎也看到了收成。但是我深知，在文学这块土地上，舅舅、路遥等众多前辈们才是最忠实的劳动者。他们不仅教我作文，更教我做人！

许多东西，当失去以后才知道它的珍贵。路遥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用汗水和生命讴歌土地和人民；舅舅几十年如一日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奉献给了他的那一茬叫“文学”的庄稼。在我的眼里，作家是山，一座雄伟的大山；作家是河，一条汹涌澎湃的记录生命的大河。